



博物馆：如何面对敏感话题？

Museums: How to Deal with Sensitive Topics?

马 萍 潘守永

Ma Ping Pan Shouyong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内容提要：2017年的博物馆日主题不仅代表了博物馆叙述、表征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标志了博物馆社会职能的拓展。在面对敏感话题时，由于不同利益群体对于记忆的竞争与争夺，博物馆往往从促进交流与合作的“接触地带”演变成各种矛盾经验回荡的“冲突地带”。通过对英国阿尔斯特博物馆“战争展”和加拿大战争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展”两个展览的探讨，本文旨在展示博物馆“接触地带”的多重面向，并进一步思考在面对难以言说的历史时，博物馆如何以更加恰当的方式介入，以减少冲突，并更好地发挥其社会职能。

关键词：接触地带 敏感主题 社会职能 冲突地带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sensitive and difficult topics, museums can easily turn from being as a contact zone to a conflict zon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multiple aspects of museums as a “contact zone” by discussing the “Troubles Gallery” in Ulster Museum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Gallery” in Canadian War Museum.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will reflect on how museums can be involved in difficult and sensitive history in a much more appropriate way and how to achieve its social role in a better way.

Key Words: Contact zone; sensitive topic; social role; conflict zone



2017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博物馆不仅要展示光辉、美好的历史，同时也要讲述具有争议性的、不愿意被触碰的历史话题。这不仅代表了博物馆的叙述、表征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标志了博物馆社会职能的拓展。历史是对记忆施以社会规范的工具，而博物馆中保存的集体记忆是根据当下的情境被不断重构、再解释的。讲述有争议的历史意味着博物馆需要积极地介入今天社会各类矛盾的化解及冲突记忆的调和当中，可见，博物馆的社会职能已是当今博物馆界的热点话题。

今天，社会职能的发挥效率已成为衡量一个博物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博物馆不再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服务于专家、学者的象牙塔，而是一个供社会大众交流、共享的平台、空间。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使用“接触地带”（contact zone）一词来形容博物馆这一社会角色的转变。学者们认同作为接触地带的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展示空间，一个文物收集的储藏间，更是一个各种文化观念、经验进行交流、融合的场所，对促进相互理解，推动社会发展、变革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克利福德，还是之后的许多学者，在运用“接触地带”这一概念时，都更偏向于其交流、共享的内涵。然而，如同今年博物馆日主题所讨论的，当面对有争议的、敏感的话题时，博物馆如何能够以恰当的形式介入？本文认为鉴于历史的多面性及个体记忆的多元性，与博物馆内保存、再现的集体记忆的同质性和均质性本质相矛盾，因此，争论、冲突往往是此时博物馆面临的最显著的问题。不一致的记忆使得博物馆往往处于被动，甚至是受攻击状态，成为一个各种冲突经验回荡的场域。

接下来，本文将从博物馆学思潮下发展起来的接触地带这一视角出发，分析英国阿尔斯特博物馆（Ulster Museum）“战争展”和加拿大战争博物馆（Canadian War Museum）“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呈现出博物馆“接触地带”概念的另一面向——冲突面向。通过对博物馆内不同记忆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及冲突的描述，思考博物馆在面对难以言

说的历史时，它是否应该为了避免冲突，而放弃其社会职能的发挥，博物馆如何才能更好地介入实现提供给大众思考的空间，并帮助他们批判性理解历史和过去的社会责任。

一、新博物馆学产生后博物馆社会职能的凸显

新博物馆学的产生被誉为20世纪博物馆学理论上的第二次革命。其代表人物彼得·弗格（Peter Vergo）在《新博物馆学》一书中将新博物馆学定义为“一种对旧博物馆学、博物馆内部与外部专业普遍而广泛不满的陈述，旧博物馆学的疏失在于太过于重视博物馆的方法，而忽略了它的目的，博物馆学在过去很少被提及或受到重视……除非彻底地对博物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予以重新检验——这并非意味着仅仅以更多的增加收入或更多的观众作为标准来衡量博物馆的成败……否则博物馆将会发现自己已到处被人看成是‘活化石’罢了”。反思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强调社会服务，探寻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构建博物馆与社会间的新型关系，是新博物馆学理论的核心^[1]。正如史蒂芬·E·韦尔（Stephen E. Weil）所指出的：“今天，收藏已不再被认为是博物馆价值的首要衡量标准，相反，其社会职能是否有效发挥成为检验一个博物馆成功与否的重要准则。”^[2]研究社会需求的现实问题、完善社会教育体系、协调社会矛盾、治愈社会创伤、帮助大众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和过去、构建多元化的再诠释与再协商的公共沟通领域都是博物馆实现社会职能的重要议题。

二、博物馆“接触地带”理念的发展

在这样的思潮下，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克利福德使用“接触地带”一词来形容博物馆从过去仅服务于专家、学者的象牙塔，到致力于打造供社会大众交流、共享的平台空间的转变。

“接触地带”一词最早由玛丽·露易丝·普



瑞特 (Mary Louise Pratt) 在语言学基础上形成、提出。她解释道:“接触地带是一个殖民遭遇的空间,地理与历史意义上相互分开的人或群体在这一空间中彼此接触,并建立持续性联系,而且往往涉及压迫、种族歧视和难以化解的冲突。”^[3]之后,这个概念被克利福德引入新博物馆学研究中。他认为“传统意义上仅将博物馆作为普遍文化的收藏,价值无涉的贮藏室,进步与发现的场所,人类、科学与民族遗产的集聚地是不够的”^[4]。在他看来,博物馆世界的认知应当采取一种“接触视角”(contact perspective),将所有的文化收藏策略作为一种对支配(dominance)、等级(hierarchy)、反抗(resistance)与动员(mobilization)等具体历史现象的回应,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口号是如何与具体的社会场景联系起来的。

克利福德采用接触视角分析了西方博物馆如何诠释他者文化,为曾经殖民的群体提供互动空间,由此阐述博物馆需加强对非西方的关注和权利的共享。由于“接触地带”这一视角将博物馆视为一种保存不稳定的不同文化遭遇的永久性场所,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理解为位于权利中心的静态、整体性机构。这个理念契合了新博物馆学思想下对于博物馆角色转变的需求,因此,此概念一经引入,便引起了博物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并被不断地拓展、再诠释。

里安农·梅森(Rhiannon Mason)进一步研究后指出:“对于理解接触地带,应跳出克利福德原设的殖民主义情景,不但突出对原住民文化再现中关注文化接触和他者/自我的构建,也需要放在更加普遍的环境中去理解。”^[5]他认为接触地带的视角应延伸至所有类型的博物馆的分析思考中。博物馆需强调与学术群体之外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这就要求博物馆加强与所在社区观众的互动与交流。博物馆内知识的产生、传递不应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劳拉·简·史密斯(Laura Jane Smith)进一步补充道“在遗产阐释或者博物馆展览的设计、运营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学者向相关利益群体咨询、沟通与对话,倾听社

区的声音。当然,这并不是说大众想要什么,博物馆就给他们什么,博物馆还肩负着帮助大众批判性理解过去的社会责任”^[6]。于是,有学者利用这一视角分析历史展览被幸存者再诠释的过程,也有学者利用这一视角描述社区博物馆的构建过程。安德里亚·威特科姆(Andrea Witcomb)延伸、拓展了“接触地带”概念的外延,他使用“对话接触地带”(dialogue contact zone)一词来思考新媒体时代互动媒体创造出的具有对话性质的展览结构;哈里特·珀基斯(Harriet Purkis)则使用“沟通接触地带”(communicative contact zone)来形容如何使用非语言形式,比如图片、影像、数字等其他形式,来塑造互动的博物馆、艺术馆空间^[7]。

可见,作为一个流动性的概念,“接触地带”经过博物馆学者们的不断诠释,内涵已更加丰富。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性空间,也是一个社会空间,同时,作为一种新型视角,它使得对博物馆空间内的多种要素(尤其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群体)的分析成为可能。

然而,大多数学者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更多偏向其交流、互动、共享的内涵。为此,罗宾·博斯特(Robin Boast)反思道:“尽管近年来博物馆的氛围更加民主,但是少数人仍然掌握着展陈叙事如何构建、展品展项如何诠释的主导话语权。不应仅仅看到这一接触空间内产生的各种积极效应,争论、冲突也是需要考虑的部分。”^[8]的确,在处理敏感、棘手问题时,与其说博物馆是一个交流、合作地带,不如说博物馆是一个冲突、竞争地带。接下来,本文将通过英国阿尔斯特博物馆“战争展”和加拿大战争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展”两个例子,探讨并呈现博物馆接触地带“冲突”的另一面向。

三、英国阿尔斯特博物馆“战争展”

英国阿尔斯特博物馆是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州立博物馆。阿尔斯特博物馆保存、展示了一大批以自然、历史、艺术为主题的文物,是北爱尔兰最大的博物馆。其中,2010年开放的“战争展”



是该馆第一次尝试以近30年来北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社区成员之间不断重复发生的激烈暴力冲突为主题的常设展览。正如展览内容所暗示的，整个展览无论是筹划过程，还是最后的开放过程，都充斥着暗潮起伏的争议，经历了协调讨论、再诠释与再协商。

北爱冲突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1998年4月10日签订北爱和平协议后，才基本中止。作为一场内战，北爱冲突几乎牵扯了贝尔法斯特大部分的民众。直至今日，北爱仍拥有两套（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基础教育系统，双方的隔离仍然严重。进入21世纪，随着北爱和平进程的推进，政治环境日益改善，北爱政府着手推动了一系列社会项目来愈合曾经的创伤，调解社区间的矛盾，创造共享未来，改善城市形象，以满足一个新的、多元文化的爱尔兰社会的需要。博物馆，是这一系列社会项目的重要场所。

作为将“创造一个共同未来”为己任的展览，“战争展”在筹备期间，社会各界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博物馆馆长威廉·布莱尔（William Blair）称“战争展”是政府和平项目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标观众既包括本地人，也包括外国游客。政府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塑造一个共同的战争集体记忆，以此缓解引起社会不稳定的诸多矛盾。而对于北爱博物馆而言，“战争展”也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北爱博物馆首次在官方常设展览中诠释这一历史事件，是博物馆发挥社会职能的重要举措。

为了更好地展示这段历史，博物馆还特别组建了专家咨询小组，由政府人员、博物馆工作人员、历史学家及不同社区的代表构成，希望可以通过交流、沟通促进展览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实现将博物馆打造成为一个可以囊括各种观点、促进相互理解的交流地带。然而，在创伤记忆中，尤其是当北爱社会中曾经对立双方的记忆仍很鲜活时，共识非常难求。咨询小组中不同的人群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冲突、矛盾由此展开。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展览最初筹划时希望通过以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去讲述北爱

冲突。在相对中立、客观的理性叙事主线下，穿插一系列的个人故事。在展陈手段上，希望以多元化的方式去呈现过去。展览试图在入口处布置一面记录了所有在冲突中死去人们的姓名墙，以表达对他们的纪念和哀悼。然而，这样的设想在咨询小组讨论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首先，个人故事环节被认为是极易催生矛盾的叙事方式，因为一位罗马天主教徒的受害体验，在新教徒成员看来，不仅不能引发同情心，反而会被理解或解释为一种加害的经验。物品，尤其是武器也会引起持不同立场的人们不同的感受。譬如一挺爱尔兰共和军机关枪就会引起新教徒观众强烈的反感，它会被人们误解为爱尔兰共和军政治宣传象征的延续。

就这样，展览最初的设想与大纲经过咨询小组多次讨论，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为了避免引发更广泛社群的冲突，最终展览与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展览规模缩小了很多，同时，文本叙事也十分谨慎，不仅删去了当事双方的证词和口述史部分，甚至连冲突爆发的原因都以极少的篇幅带过。观众抱怨展板上除了大段大段的文字，就是极少数黑白的照片。可见，致力于调解社会矛盾，以创造一个“共同未来”为己任的博物馆，本应成为交流与共享的接触地带，在面对不同记忆主体的冲突记忆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不同派别进行权利较量与争夺的角斗场。

四、加拿大战争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展”^[9]

加拿大战争博物馆是加拿大最大的收藏有关战争物品和资料的博物馆。2005年，新扩建的展馆坐落于渥太华河畔和国会山西侧的显要位置。新馆着重介绍发生在加拿大本土，加拿大军队参与，或对加拿大及人民有重大影响的军事冲突。展出内容从早期的原住民冲突开始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反恐战争”。作为表征加拿大建国史的国家记忆场所，战争博物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不同政治群体展开争夺与较量的重要场域。其中，有关“空中袭击”展示单元的争议、冲突最多。



“空中袭击”展示单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厅的组成部分。这一单元主要展示了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工业、军事设施等展开的疯狂空中袭击。为了帮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反思这段历史，博物馆策展人员尝试在叙事当中融入、再现历史背后复杂纠葛的历史情境。为此，文本不仅介绍了“空中袭击”的目的、战略，而且在主展板右侧配有三段辅助文字。第一段是来自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的观点，他认为空中袭击有效地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段来自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他认为空中袭击并不是赢得二战最后胜利的主要因素，对德国的空战尽管有效地打击了其军事力量，但实际上，对工业建筑及民用建筑的摧毁程度远甚于对其军事设施的摧毁。第三段来自于当时执行轰炸任务的一位飞行员W·E·沃恩（W. E. Vaughan）的观点，他写道：“我不止一次认识到，这场空中袭击将会导致多少无辜平民身亡，但你无法细想，这就是战争。”

策展人员希望通过这三段辅助文字深化观众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通过提供含纳各种观点的多元信息，激发观众对战争、伦理等议题的思考。然而，老兵们对这样的方式提出了强烈抗议。老兵们认为这样的观点会给观众造成误解，会给人留下空袭战争是无效的、不人道的，甚至他们是战争罪犯的印象。因此，他们发起了“抵制博物馆”运动来要求博物馆对展陈内容作出修改。

事实上，作为这段历史叙事所关涉的利益主体，老兵是博物馆自筹划以来最重要的咨询群体。博物馆馆长乔·格尔茨（Joe Guerts）曾在一份博物馆筹备文件中提到博物馆的阐释与展示不能离开与老兵们的沟通与对话，与他们的交流、咨询必不可少。创伤、棘手记忆最重要的特征，即它的亲历性。可以说，亲历历史，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立场或姿态。“亲历性赋予亲历者某种绝对的优势或权威性，这种优势类似于某种感情上的或道德上的优势，先天地承担起验证历史之确定性和可信度的责任。”^[10]

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老兵发动了电视、杂志等各类媒体对博物馆展开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最终，考虑到记忆主体的情感问题及对观众可能造成的对历史的误读，博物馆删除了三段辅助性文字。可见，历史事件的记忆主体与博物馆所欲构筑的集体记忆之间的任何偏差，都会使得博物馆从一个交流地带演变成一个冲突经验回荡的场域。

五、博物馆社会职能再思考

上文的两个例子显示，无论是英国阿尔斯特博物馆的“战争展”，还是加拿大战争博物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在面对历史伤痕、棘手遗产及涉及国家历史认同与民族情感等观点复杂的问题时，博物馆往往需要格外谨慎。历史是拥有不同面向的，这导致人们的记忆也是有矛盾、冲突的。作为塑造集体记忆，强化认同感的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不同群体展开记忆争夺与较量的场域。此时，作为各方经验交流、互动的博物馆空间会因为这一记忆的竞争而不再表现为接触地带平和、共享的面向，而呈现出一种冲突状态。为了避免引发负面的社会效应，博物馆在处理这些信息时，不得不审慎再三。毕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博物馆的政治、教育功能决定了其叙述的内容及尺度。

然而，在面对难以言说的历史时，博物馆可以为了避免冲突，而放弃其本应负有的帮助大众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和过去、构建多元化的再诠释与再协商的公共沟通领域和协调社会、治愈社会创伤的社会职能吗？无论是英国的阿尔斯特博物馆，还是加拿大的战争博物馆，他们都在主动地不断尝试发挥其文化机构、社会调和工具的社会角色。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在介入敏感话题时，博物馆不仅要有社会情怀，更要有适当的方法，否则，不仅不能施展其社会职能，反而会制造混乱。

以阿尔斯特博物馆为例，继2010年“战争展”之后，为了继续发挥博物馆社区“黏合剂”的功能，两年后，阿尔斯特博物馆又策划了一个新的关于战争的展览。不同于上一次的史实展，为了减少



冲突，此次展览被定位为一个关于战争时期艺术品的艺术展。与饱受争议的“战争展”不同，此次艺术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了北爱当地各界人士的好评。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总结到，或许相比于文字，艺术品可以更好地处理敏感话题，它们能够以更直观、和平的方式触动观众的情感，并利用这样的情感，激发他们对于过去的理解和对战争的反思。

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在尝试叙说敏感主题，直面冲突。如2016年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战火中的人道展”就是一个在面对冲突性话题时，表现出应有的深度和独特艺术表现能力的展览。人道主义精神本身不仅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冲突的产物，其自身也充满了冲突。自救援性组织和行动产生以来，便一直伴随着“政治傀儡”“大国控制”等一系列冲突性的争议^[1]。虽然这些争议在国际红十字会自身的官方宣传材料中一度讳莫如深，但是首都的展览却旨在将这些问题抛出，引发观众的思考。展览并不是展开大篇幅的批判，而是以问题的形式抛出，如特地在展览末尾处为争议内容单独设立一小空间，空间展墙上写着“为什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探视纳粹集中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变成

刽子手的帮凶了吗”“为什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谴责当时的迫害和驱逐行为”等问题，留给大众足够的话题和思考空间，积极引导他们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和红十字会的社会责任。

随着近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推进，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迅猛。免费开放的政策使得博物馆的服务对象从观众拓展到公众，推动了博物馆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使博物馆更加充满活力，更加融入社会，其社会职能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2]。今年，“博物馆与有争议的历史：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主题更加要求博物馆积极地介入当今社会各类矛盾的化解和冲突记忆的调和，以及对历史和过去的反思。本文从“接触地带”的视角出发，展现了博物馆在面对敏感话题时可能造成的冲突效应，旨在说明在面对不同记忆主体的竞争与争夺时，博物馆极易成为冲突经验回荡的场域。此时，博物馆需要格外谨慎，以更加恰当的展示手段或是艺术效果去叙说和再现争议。如何汲取各国博物馆的经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责任，形成更多的像首都博物馆“战火中的人道”这样具有深度的展览，这一切都考验着中国博物馆的专业和胸襟。

注释

- [1] 张文立：《当代西方博物学研究的主流趋势》，《中国博物馆》2014年第2期。
- [2] Stephen E. Weil. Making museums matt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2: 2.
- [3] 杜辉：《据有他者：帝国、知识与台湾原住民物品收集实践（1850—1945）》，中央民族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13页。
- [4] 尹凯：《重绘地方：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页。
- [5] Rhiannon Mason. Culutral theory and museuism studies. MA: Blackwell 2010: 17—32.
- [6] 劳拉简·史密斯、侯松、谢洁怡：《反思与重构：遗产、博物馆再审视》，《学人访谈》2014年第1期。
- [7] Harriet Purkis. Making contact in an exhibition zone: displaying contemporary cultural diversity in Donegal, Ireland, through an installation of visual and material portraits. Museum and society, 2013. 3(1): 50—67.
- [8] Robin Boast. Neocolonial collaboration: museum as contact zone. Musuem anthropology, 2011, 34(1): 56—70.
- [9] David Dean. Museums as conflict zones: the Cannadian War Museum and bomber command. Museum and society, 2009. 7(1): 1—15.
- [10] 赵静蓉：《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 [11] 王思渝：《观展：直面冲突——首都博物馆“战火中的人道”展》，<http://www.toutiao.com/i6356485157662228993/>.
- [12] 单霁翔：《关于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1期。